

中国经济史考证

第三卷

[日] 加藤繁 著

吴杰 译

商务印书馆



2 022 031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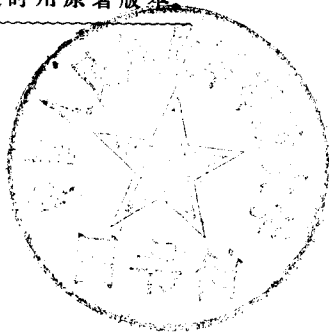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史考证

第三卷

〔日〕加藤繁著

吴杰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3年·北京

60007/25
C3

本书根据 1953 年日本东洋文库出版的加藤繁著《支那经济史考证》下卷译出。

内部读物

中国经济史考证

第三卷

〔日〕加藤繁著

吴杰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 1/2 印张 6 插页 191 千字

1973 年 11 月第 1 版 197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17·128 定价: 0.9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文分上、下两卷。中译本分四卷，第一、二两卷已分别在1959、1963年出版。现在出版的是第三卷，其中收录原书下卷后半部论文十七篇，内容主要是考证中国清代的经济(货币、财政、盐法、定期市等等)和某些主要农作物的发展情况。

关于本书作者加藤繁(1880—1946年)，在中译本第一卷的“译者前言”中已略有介绍。他是日本近代史学界中较早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资产阶级学者。他读完东京帝国大学选科后，曾任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普通科副主任，1907—1915年间曾参加当时日本政府为侵略目的而设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参与《清国行政法》等的编纂。他一生中曾历任庆应大学、东京帝大、京都帝大等校教职；著有《唐宋时代的金银研究》(曾有中译本)等书。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史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其研究方法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利奥波尔德·封·兰克的影响，同时也多少吸取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他赞成兰克的如下主张：“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在于研究各个事实，阐明其真实情况，排斥想象，排斥其他理论学说，排斥政治上的主义和宗教教义等等，而从远大见地出发理解斗争当事者的意图。”所谓排斥其他理论学说，实际上就是要排斥历史唯物主义。作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正象马克思批评兰克的那样，往往偏于“轶事的整理”和把一切大事情归结为“微细的和琐碎的溯源”。作者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个别经济现象、经济问题上进行史料的鉴定和排比编纂，进行事实的考订，典章制度的诠释，如此等等。这种研究不触及阶级斗争、

社会历史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矛盾，自然不能透过表面的经济现象看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不能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和历史发展的本质，而陷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学术研究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尽管作者提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要客观”，要“排斥政治上的主义”，实际上他在一些问题上却鲜明地反映出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例如，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海关即在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控制下，成为它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关税也不过是外债和所谓赔款的担保品之一。作者却说什么“洋关收入逐渐成为（清朝政府）有力的财源”。又如，厘金是1853年清朝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设立的一种国内地方关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等纠合的地方军队都是靠厘金收入维持的，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又对曾国藩等之“努力于这种制度的普及”大加赞赏。同时书中对我国历代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提法，对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颇多歪曲之处。

但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工作中积累的不少史料，以及对这些史料进行的校勘、注释和整理工作，对我们了解某些经济现象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他对某些专题进行的探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观点，以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我们还是把他的这部著作翻译出版，以供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中译本除对个别严重歪曲史实的地方有所删节外，一般都未予改动。原书引用的原始资料大多出自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至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手笔，常有诬蔑人民和歪曲事实之处，对此不另加注，请读者在参阅时注意。

商务印书馆 1973年11月

例 言

一、本书是收录文学博士加藤繁先生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学术论文的《中国经济史考证》的下卷。（译文分为第二卷、第三卷）

二、所收论文的排列顺序，大体上，论文根据主要对象的时代顺序，时代相同的，分别编辑于各个事项。因此，不根据论文发表的年月排列。在各篇论文之末记着发表年月和登载的书名或杂志名称。

三、本卷以宋代和宋以后的时代以及有关历代的论文三十七篇为正篇，加上附录五篇、加藤繁博士的小传、年谱和著作年表。（译文第三卷收论文十七篇）

四、论文中的引用文，由编者一一查对原书，以期无误。

五、本文、注文中，用圆括弧的都是著者的注。编者附加插入的部分，几乎都用方括弧，以资区别。

六、中国的年号下，尽量插入公元的年份。大部分是编者所加，一律用圆括号。

昭和 28 年 (1953) 2 月 20 日

编纂委员

和田清 青山定雄 榎一雄 周藤吉之

中嶋敏 中山八郎 西嶋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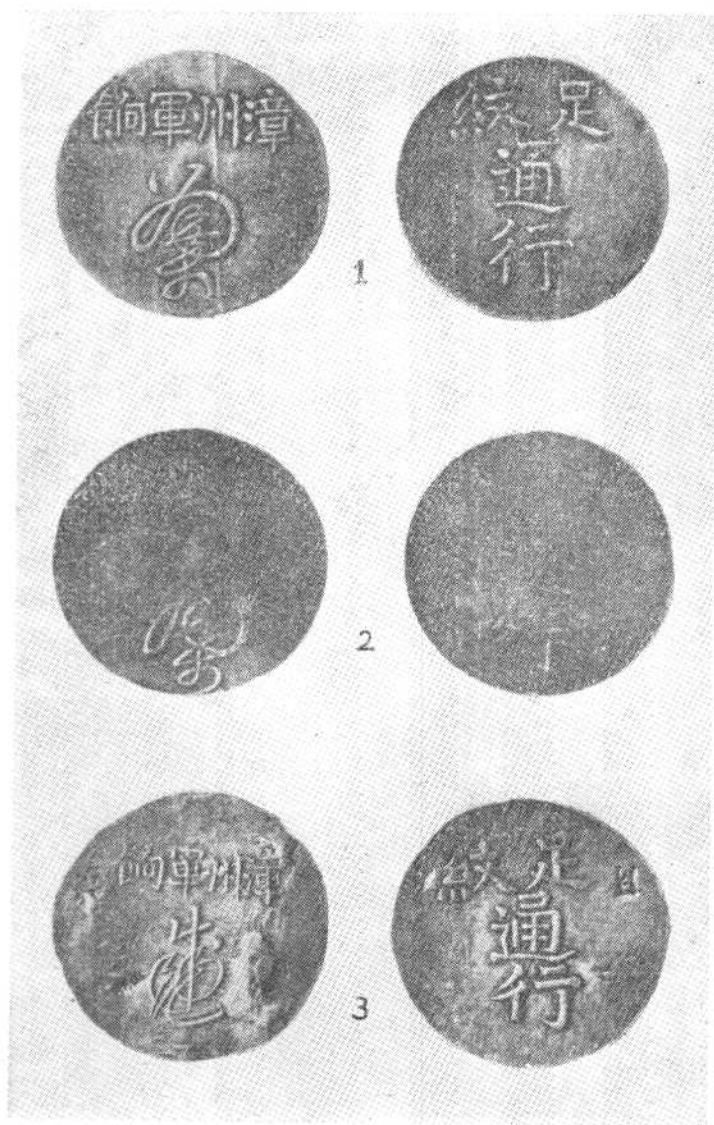


图版第一

1. 道光年铸足纹银饼 2. 笔宝银 3. 双如意银

1、2.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3. 林熊光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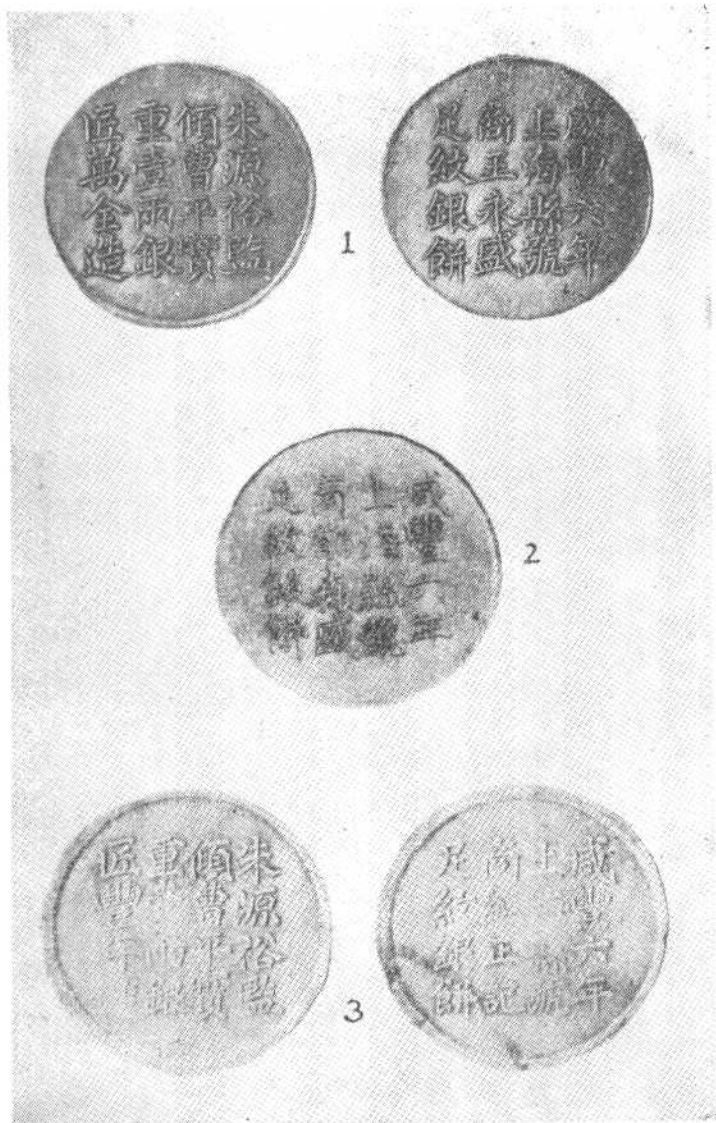
(参看《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补遗》)



图版第二

足纹通行漳州军餉银

1. 北浦大介藏 2. 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藏 3.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参看《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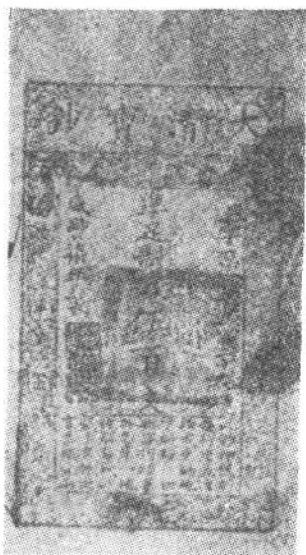


图版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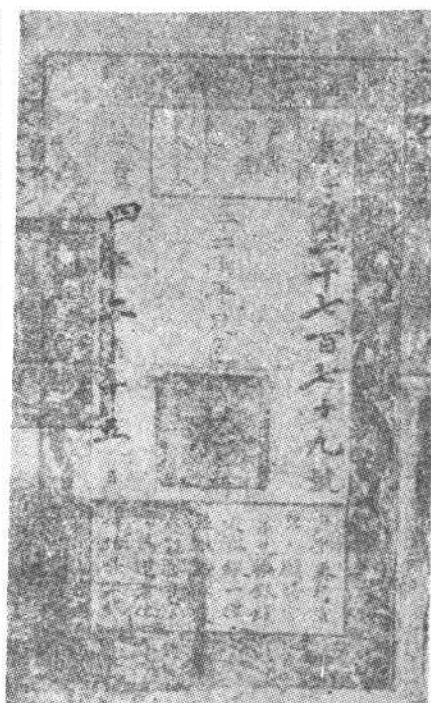
1. 咸丰六年上海足纹银饼(王永盛) 2. 同上(郁森盛) 3. 同上(经正记)

1,2.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3. 方若(药雨)藏

(参看《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补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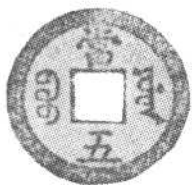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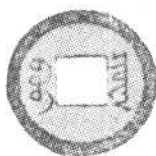
1



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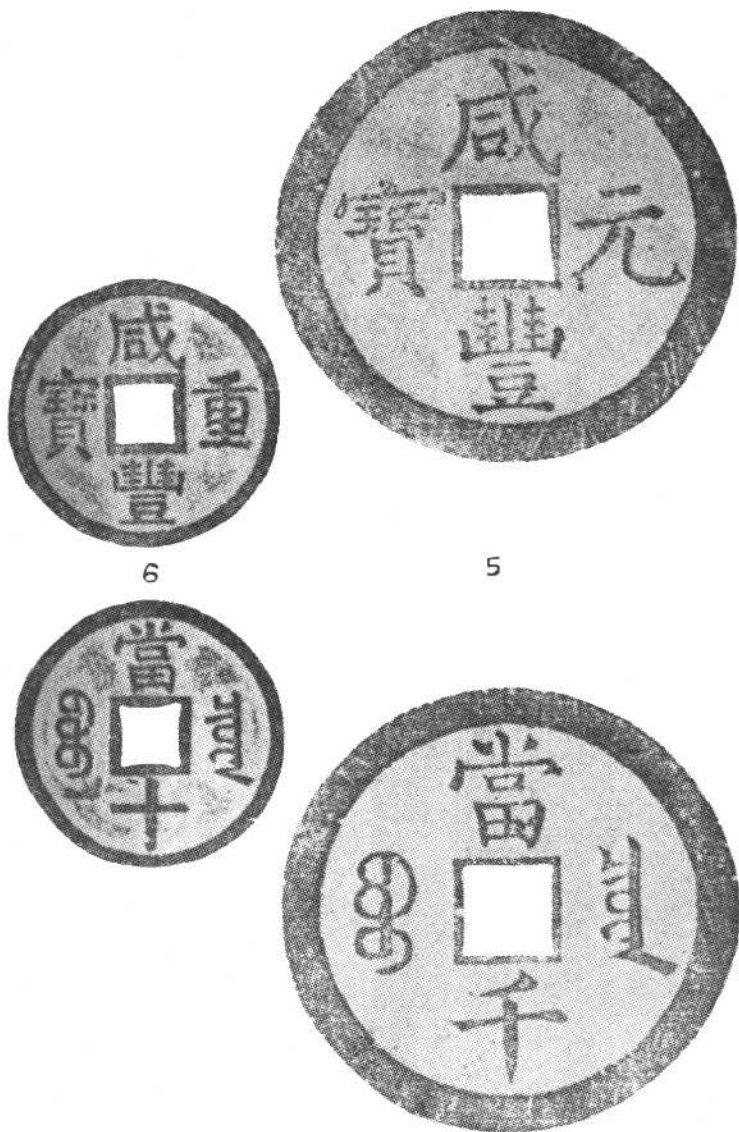


图版第四

1. 户部官票 2. 大清宝钞 (19 厘米×12 厘米) 3. 咸丰通宝 (制钱一文) (满文宝泉) 4. 咸丰重宝 (当五大钱) (满文宝源)

1、2. 著者藏 3、4. 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

(参看《咸丰朝的货币》)



图版第五

5. 咸丰元宝(当千大钱) 6. 咸丰重宝(当十大钱)

5,6. 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

(参看《咸丰朝的货币》)

目 录

例言

图版

四二	咸丰朝的货币	1
四三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	20
四四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铸造的洋式银币补遗	28
四五	清代钱铺钱庄的发展	31
四六	清朝后期的财政	43
四七	清代的盐法	54
四八	清代村镇的定期市	64
四九	清代的北京商人会馆	101
五〇	清代福建江苏的船行	123
五一	康熙乾隆时代关内外的通商	131
五二	中国史中公私债务的免除	149
五三	中国稻作的发展——特别是品种的发展	167
五四	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	183
五五	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	197
五六	东北大豆豆饼生产的由来	207
五七	中国主要产业的发展	217
五八	中国的害虫驱除法	228
	后记	240
	参考书名和篇名索引	248

四二 咸丰朝的货币

我想谈一下清咸丰朝的货币。如所周知，太平天国前后继续十五年，动摇了清朝的基础。清朝依靠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力量，才保住了它的社稷。因此，一方面，清朝遭遇到了非常的财政困难。换句话说，因为动荡蔓延的各省秩序混乱，租税中的最主要的部分——地丁钱粮以及盐税、关税等的收入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收入这样减少，而为了讨伐，相反地又需要大量的军事费用。不但如此，咸丰元年(1851)，南河丰北厅的堤为洪水冲溃，恢复工程也继续了几年，需要不少经费。因此，清廷为摆脱这种财政难关煞费苦心。实行的财政补救办法是形形色色的，其中最主要的只有三种：一种是扩大捐官的途径，一种是兴办有名的厘金和其他新税，一种就是现在想说的发行新货币。厘金、捐官等，这里略而不谈。新的货币，首先是在咸丰3年(1853)2月，刚巧在太平天国军攻陷南京时，开始发行的官票。这是代替银两使用的纸币。以后，继续发行了宝钞。这是代替钱使用的纸币。以后，继续发行了大钱。大钱有当十大钱、当五十大钱、当五百大钱、当千大钱等多种。发行这些大钱是想要节约钱的原料和铸造的费用。此外还铸了铁大钱、铁制钱、铅制钱等。后面想说说这些情况。因为时间关系，铁钱和铅钱的情况省略不谈，专谈大钱和纸币。清朝整个货币制度极为简单，作为铸造货币的叫做制钱，也就只有一文钱。铸造货币单是这一种。银也应该说是公认的法定货币。银是不作为铸币，按照它的重量和性质使用，可以看作自然物的货币。在清朝以前，钱也不是一种，本来有过好多种。换句话说，也实行同时发行大小几种

钱，以大钱一个换小钱几十个或几百个的制度。这种制度周代也实行，王莽时、三国时也实行，唐以后逐渐减少，但是唐代、宋代和明代初年也都实行过。除铸造货币，也用过纸币。如所周知，在宋、金、元、明，曾以交子、会子、宝券、宝钞等名称大量制造纸币。但是，清朝也许鉴于历史所昭示的痛苦的经验，把纸币完全停止，只用制钱一种，作为铸造货币。而且，银只依照实际的重量使用（顺治年间曾经造过纸币，只用十年就被废止，因此，从大体上来看，可以说几乎没有用过）。到了咸丰初年，打破了清初以来的传统政策，发行大钱和官票、宝钞。不过，发行大钱和票钞的原因，不一定是由于太平天国的缘故，在此之前，已经伏着远因。对于这一点不能不说一下。

整个中国，从明代中叶以来就同欧洲人进行贸易，到了清朝更渐渐兴盛起来了，那时从中国输出很多的茶、生丝和丝绸等，而欧洲人只拿来一些印度的棉花、英国的毛织物和杂货等。因为输入品很少，输出的茶、生丝等非常多，所以中国连年出超，为此，每年有许多白银流入中国。有一个叫马士^①的人，到中国来做了长时期海关的官吏，根据他所写的论文，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尤其是到 1830 年左右，至少有五亿元墨西哥银流入中国。可是，从道光初年起，货币市场的形势突然变化。那是什么缘故呢？那就是鸦片输入激增的结果。在明代，鸦片是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的；到了清朝，专由英国人之手加以输入。它最初是当作药品使用的，中国政府最初也把它当做药品来处理，在海关税则等里面长期列入药剂这一类。从康熙时起它开始为消遣而吸用，很快传播到了

①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 年，曾任美国的驻华海关税务司，著有《中华帝国的贸易和行政》(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Empire, 1908)、《中国的行会》(The Guilds of China, 1909)等书。——译者

各方面。政府也认识到它的害处，在嘉庆5年（1800）曾经一度禁止输入，但是这个禁令成为空文，鸦片的输入与年俱增。在道光初年，就全部贸易来说，输入额和输出额逐渐接近。因此，白银的流入逐渐减少。到了道光10年（1830）左右，一变而为入超，白银每年流出。这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从未有过的事件，它对中国经济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引起了银价的腾贵。这种白银的流出，被称为“漏卮”。汉桓宽的《盐铁论》中有所谓“川原不能塞漏卮”。原有漏卮这个名词，白银流出就被称为漏卮。鸦片是有害于身体的毒物，又是漏卮之源，从这两点，引起了禁绝鸦片的议论。以后，发生了有名的鸦片战争。如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清朝遭到了失败，因此，开放了广州、厦门等五港，准许通商，公认鸦片的输入，在四年之间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元。这次战争后，鸦片的输入更为增加，从而白银的流出更甚。赔款也不能不支付，因此，白银越来越输出去。鸦片的输入额，到道光3年左右，每年的银数不过几百万两，道光4年以后渐渐增加，上升到一千七、八百万两，以后，从道光11年到14年为止，达二千几百万两，从15年到17年左右为止，稍微降低，计一千五百万两，这些都见于道光1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上奏。这些数字，不用说，是不一定十分正确的。实际上恐怕还要多。可是，这笔鸦片价银并不是全部流出海外的，流出的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根据前述马士的论文，1837年（即道光17年），中国的输入总额是墨西哥银元三千八百万元，输出总额是三千六百万两，入超不过二百万元。这二百万元，不用说，是由于鸦片输入增加的结果。这是道光17年的事，到鸦片战争之后，这个数字更有增加。鸦片战争后，鸦片的输入有多少呢？根据做过李鸿章幕僚的有名的冯桂芬的书，从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在二、三千万两左右。据此可以想象，也有三、四百万两白银流出。曾经找过详细

的数字，沒有一下找到。白银就这样地渐渐流出去。因此，银价渐渐腾贵。本来，虽说白银流出，但还不那么厉害。如果从道光 10 年以来到 30 年为止大约二十年间平均每年流出三百万两，那末，它的总额就是六千万两，加上鸦片战争的赔款大约二千万两，合计八千万两，从中国所存的银的总额来看，还不算怎么大的数字，可是白银一流出，银价就上涨，这方面是很惊人的。有白银的就把它藏起来，又发生了商人收买白银的情况，于是银价越来越腾贵。

清朝从初年以来，规定了制钱和白银的比价，把它叫做钱价。换句话说，就是把银一两规定为制钱若干文的法令。钱价随着银的市价的变动而随时议定，雍正年间，以制钱一千文当银一两。到道光 21 年，京师以银一两当制钱一千三百文。以后，到了咸丰 3 年，京师以制钱二千文当银一两。咸丰 3 年的钱价，比雍正朝的钱价刚巧下跌二分之一，相反地，银价也上涨一倍。由于白银这样腾贵，无论商人、农民都感到不便，最陷于困难的是农民。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乡间物价便宜，所以农民常用制钱。卖掉谷物的时候也用制钱交易。可是，租税是怎么样的呢？这是必须用银交纳的。所以，一到纳税时期就要把钱换成白银。银价一腾贵，租税额（即以银数计算的租税额），纵使一点也没有变化，由于交税的农民要把钱换成银，就等于增加了租税。因此，道光末年，农民很苦。在这种情况下，在道光末叶的十年间，有识之士的头脑里焦思苦虑挽救银价腾贵的方法，为此创立种种方案而上奏的，前后多至十余人。其中，有几个人认为应该铸造大钱，作为挽救白银的腾贵和缺乏的手段。广西巡抚梁章钜也是其中的一个。梁章钜在道光 20 年左右就上奏：铸当千、当五百、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的六种钱，它们的重量根据同它们相当的制钱的重量适当地酌量减少，由于户部反对，没有实行。以后，也屡次有过这样的议论，都没有实行。也

有人上奏,要印制纸币。甚至有人主张恢复到太古时候那样,用贝作为货币。由此可见,无论大钱、纸币都不是到了咸丰朝才成为问题的。它实际上是道光 20 年左右以来的老题目,而到了咸丰朝,遇到货币政策的困难和财政的困难,它终于到了出现的阶段。

关于铜的供给也有说一下的必要。中国的铜的产地,不用说,首先是云南,其次是四川,其他地方虽然也有出产,不过很少。总之,说起中国的铜,主要是云南出产的,京师的户部、工部两钱局和各省的钱局使用的大部分的钱的原料,是由云南供给的。可是因为云南的铜产量不能充分地满足需要,所以购买日本的铜,以补不足。《嘉庆会典》中所载的日本的铜(即洋铜)只有一百二十万斤。中国的一斤和日本的一斤差不多相等,据说日本的一斤要比中国的多一些,但大体上可以一样看待。这一百二十万斤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实际上似乎买过更多的日本铜。日本铜或者被充作云南铜,或者被充作四川铜,送进各处的钱局。根据日本的记录,元祿时代(相当于中国康熙年间)曾经运去八百万斤左右。以后,卖给中国的铜数渐渐减少,在宝历时代(相当于中国乾隆时)是一百七、八十万斤到二百万斤左右;宽政、享和年间(相当于中国乾隆末嘉庆初)是一百万斤左右;文政到天保年间(相当于中国嘉庆末道光年间)不过在一百万斤以下。以上主要是根据胜海舟的《吹尘录》。这本书,只把它记到天保 10 年(道光 19 年[1839])为止。那一年是八十万二千余斤,在前一年即天保 9 年,是六十万斤。到了天保 15 年,德川幕府发出指令:“与中国贸易之铜宜减少;日本现在产铜虽多,唯恐铜少受困,故不宜售与中国;如能以其他物品代替,宜完全停止。”也许是由于那个指令的结果,卖给中国的铜大为减少。

就是这样,从作为货币的原料的铜感到缺乏这一点来考虑,也